历史名人在西大

——节选(三)

(上接586期)李四光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始终保持做人的操守与良知,不愿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多次表示要他出任教育部部长或大学校长,他都拒绝了。李四光在桂林时,每年都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总是要宴请到会的知名人士,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央研究院各所长均到。这一次,李四光的座位安排与蒋介石临近,李仍不出席。宴会时,蒋问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翁文灏回答说:“重感冒,发烧。”过了一会,蒋介石又问陶孟和,陶孟和也说:“李先生病了。”幸免追查——这是1951年3月翁从法国回国后亲自对李四光说的。李四光十分感激地说:“翁文灏曾经救过我一条命。”

事后,李四光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密电,要他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与尼赫鲁会谈。电函往返多次,李四光均予以拒绝。李四光最后在电函中严肃表示:“……抗日战火弥漫,始而联英抗日,现又联印反英,出尔反尔,将何始信于世人。两面美人,尤非弟所能为。请转达最高当局,另聘贤能。”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浪潮,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迫撤离桂林。这一年秋天,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能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秘密通知李四光说:“我在李济深处得知,蒋介石要抓你,快躲一躲。”钱昌照又及时到桂林见李济深,告诉他:“如有什么事,先把李四光转移。如果不避开,会像马寅初一样被抓捕关起来的。”

马寅初与李四光似有科学家相同的个性。在抗战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就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是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独裁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战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才出狱。

李四光心里明白,自己与马寅初一样,一贯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蒋曾用高官厚禄来拉拢自己,如要他代表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会谈,后来又提出要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等,都被李四光拒绝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就不得不防了。同时,他也知道桂系对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事因1941年8月,西大校长变更,高阳接替雷沛鸿任校长。但高阳在师生中印象不好,也不很受桂系欢迎,于是,地下党发起“拒高学潮”。对此事,黄旭初是“决以坚毅态度,维持秩序到底”,先是五位学生被逮捕,学校积极开展营救,多方找人说情。其中就找到德高望重的李四光。李四光年谱载:1941年,“广西当局逮捕西大学生,李四光受学生委托,三次找校长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桂系和高阳校长并不买李四光的账,共被十一人退学,四人休学,留校察看四人,予以警告两人。而1941年8月,日机由越南侵入,对桂林进行狂轰滥炸,也很不安全,政府当局决定疏散市区人口。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和他的一些学生也劝他趁机率离开良丰。

于是,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与地质所的几个同事带着罗盘、地质锤等,坐着一辆卡车外出调查地质,来到离良丰几里路外的架桥岭清平乡住下了。(据文友卯兴明先生考证,架桥岭横跨永福县罗锦、临桂区南山边山、阳朔县的葡萄等乡镇,又称蒋家岭,今属临桂南边山乡升平行政村管辖。该村紧邻架桥岭脚,与阳朔县金宝乡相邻)这里十分僻静,风景优美,有含苞的榕树、丛丛的芭蕉,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围起一道天然的屏障。靠山脚的地方有十多户茅舍,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前流过。原来,馆里有两个工人是这个村庄的,工人们平时对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都很敬重,李四光就是通过这两位工人在这儿租了两间茅屋,“隐居”了起来,专心从事他的学术著作。

夫妻俩在这宁静的乡间十分惬意,只是生活上有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晚间,没有照明设备,看书写字很是吃力,这些困难都被李四光克服了。他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工作,整理科研材料,草拟论文初稿。《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形构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在吃的方面,许淑彬为了给李四光补充一些营养,特地买了一个小石磨,自己动手磨豆子、取豆浆、做豆腐,还养鸡蛋;在房屋周围挖地种菜,青菜萝卜从不短缺,还不时托人捎点青草、鸡蛋给良丰的学生们。周恩来得知李四光在桂林的情况后,派童小鹏前去了解、联系。

架桥岭的乡居生活成了李四光夫妇在广西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这段生活既艰苦清贫又充满乐趣。本地的乡亲们同他俩也逐渐熟悉起来,过年过节有来有往,不把他俩当外人。村上的孩子们也“李爷爷”“许奶奶”地喊个不停。秋夜在榕树下纳凉时,李四光还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惹得孩子们夜深了还不愿离开这位慈祥和蔼的“李爷爷”。

一颗奇特的砾石

大凡搞地质的人都喜欢收藏矿物或岩石标本,李四光也珍藏了许多受到构造运动影响所变形的砾石标本。其中广西桂林有两颗石子曾在他的讲话中提到。

1938年秋,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成立,李四光应邀出席并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江西庐山和桂林雁山的两颗石子。雁山这颗石子是在桂林科学实验馆建馆时,从临桂六塘运来做建筑材料砾石中发现,类似扁豆状,直径平均3.5厘米,其中部最厚之处约8毫米,由坚硬的硅砂质固结而成,边缘及两面均甚圆滑,显然经过流水的冲击,中间弯曲,几成直角,然没有丝毫破损痕迹。成直角的两面之中,有一面微带研磨的痕迹。这颗石子在普通人看来毫不起眼,李四光却知“这颗石子一部分历史,就是它先经过流水的冲击,然后又经过水流的挤压和推动”。大科学家能把平常的事物理论化,李四光又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换言之,就是这些石头,在这种天然环境之下,不到它应有的力度,已经开始软化,岂不是材料力学上的谜?”

另一颗桂林的小石子却有些故事。这颗弯曲的砾石,是地质所的同事张更在雁山村附近的第四纪冰碛层中发现的。这颗小石头引起了李四光的格外注意:砾石的成分是细粒石英砂岩,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坚硬且性脆,而这颗砾石却具有十分明显的弹性。李四光得到这颗变形的小砾石,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爱不释手,特意制作了一个小木盒,里面垫上棉花,将它珍藏,以免磨损,还经常携带在身边,不时抚摸。

1941年7月7日下午,广西大学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第八届毕业典礼暨新舍落成典礼,学校请李四光做一个学术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关于一颗特殊的弯曲九十度的小砾石。他把这颗小石子定名为“马鞍石”。在会上,李四光论述了这颗砾石的弯曲形变,显示岩石的弹塑性和塑性形变。他提到了研究各种构造类型的形变规律,研究地质构造岩石形变,都应考虑岩石的力学性质,考虑各种岩石对应力作用的表现,如岩石的弹性、塑性、弹塑性、滞弹性等,这就需要结合地质现象做些岩石力学方面的试验,了解各种岩石在不同加力的条件下的反应。

讲到这里,李四光非常兴奋地说:“在这方面,自然界给我们做了不少实验。”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把里面装的马鞍形的小石子,让大家在下面传递欣赏,并兴致勃勃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地质,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石头,它告诉了我们很有意义的知识,它比宝石还要宝贵得多。”

万万没有想到,在听众中有人以为这颗砾石是“无价之宝”,居然暗中藏匿起来。演讲完毕,奇石却不翼而飞了。李四光暗自叫苦,悔不该拿出来传递欣赏,并再三解释,这块石头不是宝石,除具有科研价值外,分文不值。尽管如此,会议结束后仍不见有人送回石子。会后,李四光只好请广西大学出个布告,请藏石者交出砾石,并给予一定奖赏;若不便直接交还,可置于校园某棵榕树洞内,并请留下地址以便送赏。可是过了两天仍未见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在那棵指定的榕树洞中发现了变形的石子,但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经过此番折腾,他很少再拿出这颗小砾石了,像宝贝一般珍藏在身边,直至逝世。他在1946年还特地写了一篇名为《一个弯曲的砾石》的短文,寄给英国《自然》杂志,介绍给同行爱好者。他认为,“砾石是由于在冰川的荷载下,以某种方式变形的”,“变形是由于砾石的一半被固紧,而另一半受到冰流的前推作用所形成的”。

马鞍石的发现,成了李四光本人划时代的代表作《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的前奏。

恋恋不舍告别广西

1941年秋,李四光带着孙殿卿、马振图和王文瑞诸位同事,对南岭东段进行了一次重要考察。这次南岭东段之行,历时两个月,李四光和他的助手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的名望,这一年的“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会”讨论后,一致赞成把第二届的奖金授予李四光,但在1942年3月的年会和颁奖仪式上,李四光却没有出席。他在会议之前就带着几个助手到外地考察去了。张更代表李四光接受。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翁文灏在会上高度评价李四光的贡献,说:“地质科学在国内外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极大。”委员会主席杨钟健在致词中说:“李先生在地质界推进之功,至为显然。丁先生第一届奖金的得主为田奇隽先生,是李先生的学生;及今年代表本会授第二届奖金的鄙人,也是李先生的学生。在座诸位会员中李先生的学生占了一大部分,然本会授奖金给李先生的主要动机,还在于李先生的研究方面。”接着,他详细介绍了李四光的治学经验,并概括为“博、精、约”,他说:“李先生所以治学至于如此程度,实有三种精神:一为有恒,李先生献身地质界二十年如一日,为同仁尽知之事。二为崇信,即治学求真之精神……三为能吃苦,地质工作者为第一苦事,李先生以高龄之年,不畏旅行之困难,与青年同仁于役山中,在目下国内地质界同仁中,能以如此高龄而尚事实际地质工作者殆无第二人……如有人令余在国内地质界中可以推荐一人为同人等楷模,为中国科学界青年之模范,吾以为除李先生外,实无第二人可以当之。”

综观李四光在桂林期间,科研成果累累:在伦敦出版了专著《中国地质学》(1939年)和《大陆漂流》(1939年);在国内刊出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1940年)、《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1941年)、《广西地层表》(1941年)、《地质物理学上之几个基本问题》(1941年)、《朱森■, ■科之一新属》(1942年)、《南岭何在》(1942年)、《中国冰期之探讨》(1942年)、《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1942年)、《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1944年)等学术论文。

1944年6月,正当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桂林大显身手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命运,企图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同时又从越南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包抄北上,形势异常险恶。

桂林虽是好地方,但并非久居之地,李四光考虑到在这外侵内患的动乱岁月里,恐怕只能“走得一步是一步,救得一命是一命”,他立即通知研究所留在桂林的七八位研究人员,迅速准备,先到贵阳避难。6月27日,在桂林第一次疏散中,李四光终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在此工作、生活了七年的桂林,带着夫人和同事们仓促启程,开始了艰难跋涉。

经过数月的险恶奔波,李四光同研究所的随行人员,终于在11月抵达战时陪都重庆。

1948年2月,李四光自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学会。他在国外时刻关注国内的变化,为了回到日夜思念的新中国,李四光机智地与国民党驻英大使进行斗争,终于回到了新中国。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问他中国石油的发展,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样?——因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917年,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曾在陕西陕北一带打了七口井,因为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来中国搞调查,提出了“中国贫油”的论点,一时广为流传。但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对地质力学的理论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野外考察的实践,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国的地质条件很好,地层下有丰富的石油。从那以后,按照李四光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下辽河油田和江汉油田……在我国的土地上,竟然找到几百个储油构造。

星移斗转,李四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更加紧了工作。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七级地震,他不顾自己重病,坚持亲自到震区考察灾情;1969年渤海发生地震,中央任命李四光为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时,李四光不顾八十高龄,仍不辞劳苦,调查地震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1971年4月29日,由于动脉瘤破裂,这位在地质科学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地质之父”永远离开了我们。

参考资料

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和他的时代》,科学出版社,2012年。

麦群忠著:《李四光在广西》,载《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魏华龄、李建平主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

周光召主编:《20世纪科学大师与科学大事》,接力出版社,1996年。

杨东莼：重组撤销两艰难

廖丹丹

杨东莼,1900年农历三月初八出生于湖南醴陵县西山史家老屋村,原名杨岂舆,字人杞。童年时代非常不幸,五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下面还有一个比他小三岁的胞弟杨人梗。幼年丧失父母双亲,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真是让人耿耿不已!但他后来却成长为中国革命时代中的弄潮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任西大校长的时代,正是西大合并与撤销的时代。

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

1930年底1931年初,杨东莼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他非常想回家乡醴陵去看望他的三子一女,但被友人警告说风险太大。这样他只好待在上海继续做些编译工作,同时寻找失联的地下党组织。岂不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党组织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叛变,正处于极其危急的紧要关头,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果然,1931年底他外出时被抓捕入狱。这是他五四运动时挨军警抓去关了一晚之后的第二次被捕。但他得益于一批友人的营救,得以释放。这些友人里包括了他的红颜知己、年轻的浙江姑娘冯曼莹。冯曼莹1915年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却因年少时与嫂子和,被恶嫂设计陷害卖到了上海,结识杨东莼后他们互相帮助扶持,走出劫难困境。后来经组织批准同意,冯曼莹成了杨东莼的第二任妻子,并由此陪伴终生。

出狱后,杨东莼得到好友周谷城的邀请,到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他带着冯曼莹前往广州。不想这一趟广州之行,却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

1932年初,杨东莼带着冯曼莹去广州中山大学之前,因为刘斐的关系,他与程星龄、陈公培等一起先去了一趟南宁。这是杨东莼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虽然只停了短短几天,但结识了李任仁、陈此生,并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见了面,这可是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杨东莼以后在教育、文化、抗战和统战工作多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都与广西密切相关。

当时李、白、黄正雄心勃勃地拟定“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纲领,要把广西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抗战中的西南保障,提出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目标任务,实施相对开明的各项政策,大力招揽各方精英人才。而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培养本省教育骨干力量,成为建设模范省的重要一环。正逢这样的时机条件,所以刘斐推荐杨东莼出任广西师专校长时,立即得到对杨已有良好印象的白崇禧、李任仁的同意。

1932年暑期,在中山大学任教了一个学期的杨东莼又回到上海,这时接到广西当局的聘书。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蒋蒋矛盾使广西成为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空白点”,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到广西办教育、适当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可以有的为的。于是在李、白发电邀请和刘斐多次催促之后,8月底他从上海到桂林,再由刘斐、田良骥(也是醴陵同乡同窗好友,时任桂林县长)陪同,到南宁面见李宗仁、白崇禧。这次他在南宁住了较长时间,在白崇禧、刘斐的宜园待了一个月。在充分了解情况和做了一定准备工作后,10月上旬,在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陪同下到桂林,10月12日在雁山广西师专举行的首届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作为广西师专首任校长,他拟定的八个字校训“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由广西师大一直沿用至今。

三十年代初广西省政府决定办广西师专,地点原定在南宁市内的工程学校旧址。著名的教育家、灌阳人唐现之从中山大学调回来任师专筹备处主任。他是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高师的得意门生,崇尚陶先生办晓庄乡村师范的理念,不满意在市区内办学,建议学校北迁到桂林市南郊外的雁山公园(即西林公园),获得批准。因此雁山园从1932年起就成为广西师专的校园。1936年广西大学迁入桂林,师专并入西大并改组为文法学院,雁山园又成为西大校园。雁山园的山水园林、花木亭榭总体布局格调,给杨东莼很好的印象,也让他常常联想起醴陵淩江书院,说“这才是办学读书的好地方”。淩江书院曾是他父亲杨策和程潜读书的地方,这里走出了李立三、陈明仁等人。1924年3月,杨东莼从长沙回到醴陵担任过淩江中学校长,引导支持学生们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研究社的三十多个成员里就有左权、蔡申荣、宋时轮、陈恭、陈觉等人。他同样希望在广西涌现出大批的栋梁之材。

在广西师专初建时,曾一度出现过“杨、唐之争”,这是杨东莼上任校长后与原来的筹备处主任唐现之在办学思想上出现了分歧,师生里也因此形成了两派观点。后来是教育厅将唐现之调回南宁。在欢送会上,杨、唐两位教育家却互真心地称赞对方,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给人印象深刻。当时教育学教授张宗麟(浙江绍兴人),曾毫不客气地说杨东莼、朱笃一“把广西几乎变成湖南人的‘殖民地’了”。但后来张宗麟到上海参加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杨东莼等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在救国会、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等各个组织都与杨东莼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对杨东莼也表示了由衷的敬重钦佩,以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初他在

教育部任高教司副司长时,也力荐拥戴杨东莼出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杨东莼广聘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到师专来任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笃一(朱克靖)和薛暮桥,1934年5月,白崇禧首先“礼送出境”的是朱笃一,紧接着杨东莼被迫“辞职”,和薛暮桥两人一起一路同行地被“礼送出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东莼从上海回到长沙,在友人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当高参,薛暮桥也携带着他一直主办着的《中国农村》,从上海撤到南昌再撤至长沙,编辑出版工作及自己一家也住进了杨家。巧的是1938年薛暮桥和朱克靖这两位广西师专的老党员老同志,又不约而同地一起参加了新四军。薛暮桥先是教导总队任训练处副处长、政治教育;后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朱克靖到新四军总部任顾问、联络部长、秘书长。

就在桂系“礼送”杨东莼出境之后不到两年,桂系又把杨东莼请为座上宾。

原来早在1934年,桂系李、白就曾派黄旭初到江西中央苏区与潘汉年、何长工进行秘密谈判反蒋抗日,红军也派出过宣侠夫、谢和赓来桂谈判;1935—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桂系又派过刘仲容多次北上谈判,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当然最出彩的还是1936年“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的完善处理,这里面就有杨东莼出色的统战工作。

本来杨东莼在师专被白崇禧“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后,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抗日文化救亡活动,特别是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一起组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后来进一步拓展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牵头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各项工作。1935年,杨东莼经救国会里地下党员曹亮介绍再次入党。但是,1936年6月1日,爆发了“六一事变”,蒋介石与两广势力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在蒋介石用计分化瓦解了广东陈济棠军队后,桂系李、白与蒋的对峙,成为全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斗争的焦点。李、白再三电邀当时威望日增的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赴桂共商国是。救国会仔细研究后认为沈去不宜,决定改派杨东莼为救国会全权代表赴桂。他在桂系“群英会”上“舌战群儒”,不赞成另立政府的“开府立国”,主张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奠定了基础。他的才高智勇,给李、白印象深刻。同年10月和年底的“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杨东莼又两次代表救国会来到桂林、南宁,继续做李、白以及李济深的工作,特别防止有人调唆桂系的“乘机起事”。西安事变后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对桂系的没有“异动”表现很满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进入一个新阶段。

形势的发展,事态的变幻,证实了杨东莼对政治的敏感、时局的把握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也让李、白对他更加刮目相看。1938年后,白崇禧出任桂林行营主任,立即聘请杨东莼为行营秘书长,被其婉拒后才又聘他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

这样,杨东莼再次开启了他在广西的教育生涯。

出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38年末,广州武汉沦陷、长沙大火后,形势严峻,经周恩来批准,杨东莼本来准备绕道桂林、重庆到延安去,但在桂林却又又被留了下来。当时已经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后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出任主任。杨东莼到桂林后,白崇禧想要他出任桂林行营秘书长;而已到重庆地地党政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李济深,希望他到重庆来共事;杜重远先生应盛世才之邀,则想拉他一起去新疆,杨东莼也很心动并初步应承;此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连夜登门拜访,极力劝说,热忱相邀,定要留他在桂林帮他本人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作为地下党员的杨东莼,即到“八办”请示李克农,经组织批准,最终他被同意留在桂林,出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中共南方局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尽快把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抢救出港。杨东莼与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梁漱溟等人,分批经东江湖击区取道粤北、湛江等地返回桂林,再次掀起了桂林抗战文化城建设高潮。

王警华有文章回忆他父亲王忍庵先生,其中涉及杨东莼: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忍庵只在隆隆炮声中最后撤离香港,经过广西湾乘船,沿西江逆流而上返回桂林。在同行的船上有一批撤离的文化人士,其中有一对杨姓的中年夫妇,与他交谈十分融洽,也谈到自己在桂林住处很有困难。王忍庵经过审慎了解到杨氏是进步文化人士之后,就主动邀请到家去暂住,于是杨夫妇便住进了王氏桂林誉洲的书店家中。这时杨先生才说出他的真名是杨东莼,系广西当局通缉重要人物。据此,王忍庵即将杨先生夫妇秘密安排到二楼书库内居住,所有的生活起居都由他夫人单独照顾,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书库,包括孩子也不允许进去。这样秘密住了三个多月,从不下楼,房东都毫无察觉。直到形势有所缓解后,王忍庵又给了他一大笔路费,安全送他离开桂林。

1949年之后,王忍庵先生在长沙失业,报纸登出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部名单,他看到当年在桂林家中避难的杨东莼先生也列其中,负责接管国立广西大学担任校长,于是就主动与杨东莼联系。杨校长很欢迎他来广西大学工作,担任总务长秘书,于是全家第二次回到山清水秀的桂林。这是后话。

秋季,在“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高潮中,杨东莼北上北平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协商建国”。周恩来单独接见他说:“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了!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然后告诉他,具体工作有两个选择:一是潘汉年要他去上海任教育局长,二是张云逸要他去广西大学任校长。

杨东莼选择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广西。(下转589期)

责任编辑 廖文丹 黄南 刘娜丽 陶湘露 廖善维
美术编辑 刘娜丽 廖善维
实习校对员:陶芸芝 郑杏